

【图林·史志】

论四库南三阁公共开放的实践及影响^{*}

●张银龙¹ 施伟伟¹ 迟 语²

1.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湖州, 313000

2.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4

[摘 要]在四库南三阁筹建之际,乾隆已明确将其界定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国家级图书机构,并连发三道御旨,深入阐释其重要意义。自南三阁落成之日起,其各项运作,包括人事管理、财政规划、空间布局、书目编制及开放时间安排等,均紧密围绕公共开放这一中心任务展开。不仅如此,通过梳理来自上级领导、各级官员、学者及学生等不同群体的借阅活动记录可以发现,这些文人学者亲身经历的借阅案例无疑也构成了南三阁实施公共开放政策的有力历史证据。在历史发展层面,南三阁所秉持的公共开放精神及其具体实践,不仅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事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更为后续图书馆公共开放的建设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乃至民国初期的图书馆公共开放建设,在积极吸纳西方公共图书馆建设理念的同时,其根源与灵感仍可追溯至四库南三阁的开创性实践。

[关键词]南三阁 图书馆 公共开放

[中图法分类号]G25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25)03-0081-07

[引用本文格式]张银龙,施伟伟,迟语.论四库南三阁公共开放的实践及影响[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5(3): 81-87.

清代四库南三阁自建立以来,即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杭州文澜阁,在推动中国南方地区乃至全国文化和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图书馆学界对南三阁公共开放的研究较为不足,深入探讨其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文献十分匮乏。因此,系统整理相关历史资料显得尤为必要。

1 南三阁公共开放的相关准备与策略

1.1 南三阁公共开放的思想准备

乾隆设立南三阁,并明确将其定位为向公众提供借阅服务的国家级图书机构。此意图在随后的三道御旨中有充分体现。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颁布首道构建南三阁的谕旨,清晰指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1]111}乾隆明确表明,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是为了便于江南的读书人就近阅览抄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再次就南三阁颁布御旨:“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

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緡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1]112-114}乾隆进一步强调,主管官员不应过分珍视图书而损害读者之阅读权益,并首次明确表达藏书可供外借之意愿。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第三次就南三阁藏书事宜颁布御旨:“著该督抚等谆飭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2]乾隆指示官员做好书籍借阅与保护工作。他的三道御旨涵盖了制度建设和具体工作指导,强调了借阅的重要性及其影响。这体现了乾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1.2 南三阁公共开放的建筑空间准备

四库七阁的设计受到宁波天一阁风格的影响,但并非简单复制相关设计,而是有所创新以满足工作需求。南三阁内部布局经过策划,设有书籍贮藏区、管理区和阅读区。杭州文澜阁的资料较为详尽,

^{*} 本文系浙江省级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清代图书馆公共开放事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HQZZ37YB)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银龙,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与中国史;施伟伟,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史;迟语,硕士,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与图书馆史。

收稿日期:2024-10-09

责任编辑:谢伟祯

《文澜阁志》记录了其改进后的空间布局。

丁丙在《前江苏按察使司应宝时、江苏特用知县丁丙续添工程估价请款呈》中汇报:“计添造假山亭一座,二宫门一座,东西角门、左右边门各一座,待漏房九间,已不敷千三百二十元。又奉照建御碑亭一座,及东偏平厅三间,平屋五间,厨房四椽,备典守抄录肄习之所。”^{[3]374}

《重建文澜阁纪事》记载:“阁之东,别创太乙分青室,为士子愿读中秘书者憩息之所。又向西为书室五。”^{[3]400}

文澜阁为工作人员和读者设计了工作、阅读、抄录、等候区域以及后勤空间。为早到读者提供的舒适等候场所,如“待漏房”与“太乙分青室”,均体现了设计者的人文关怀。

文澜阁在光绪年间重建后,内部空间得到扩充和优化,设有独立的书库、办公处、阅览室、休息室、等待室及后勤用房,这体现了功能的明确划分和高效率利用,能够满足图书开放借阅需求。

关于文澜阁的记载比较详细,而有关另外两阁的文献比较稀少。清代完颜麟庆《文汇读书图》记载,“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庚子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斋大使,同诣阁下……爱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4]。这表明文汇阁的藏书区与阅览区均为独立设置。

1.3 南三阁公共开放的相关策略

1.3.1 人事策略

在处理图书开放阅览的事务时,需考虑工作人员的配置。然而,目前由于信息不足,相关分析只能依靠零散的数据进行。

据钱鲈香记载,“(道光庚子九月)初九日,……予进钱塘门访周竹所;竹所向为文澜阁司事,已于去冬撤职,经岳运使(镇南)委员查修,另设训导一员,总管锁钥即后湖董事章公次白(黻)而司一切晒书事务者为朱石樵茂才;是以阁中出入较严于畴昔云”^[5]。这说明道光年间文澜阁的管理人员设置较之前有所变化,在原人事架构上增加了一名训导。

《江苏特用知县丁丙送呈补抄阁书章程,并议定经费禀》在人事方面有专门详细汇报:“经理须常川看守,薪水似宜从优,每月拟支钱二十四千文,司事一人,帮理晒书,督率收拾、拔草,薪水每月给钱五千文。看门司炊人役,拟募二名,每月每名拟支钱四千二百文。”^{[3]376}该处详尽描述了文澜阁的工作人员配置,包括经理、司事、门卫、厨师各一名,此配置

显然是基于实际工作量而设定的,足以应对日常运营的需要。

根据上述两条资料,文澜阁的人事配置似乎较为紧张。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莫友芝在致曾国藩的信函中明确提到:“奉钧委探访镇江、扬州两阁四库书,即留两郡间二十许日,悉心咨问,并谓阁书向由两淮盐运使经管,每阁岁派绅士十许人,司其曝检借收。”^[6]文宗阁与文汇阁在书籍管理方面涉及十余人,由此可以推测,其工作量和借阅人数可能超过文澜阁。但目前还缺乏直接证据来支持这一推测。

1.3.2 财政策略

除文澜阁的改建和书柜配置由商人资助外,南三阁的建设主要由政府拨款资助,具体费用不详。江苏和浙江的盐政机构管理南三阁的日常运营,并保障其运营资金。据《江苏特用知县丁丙送呈补抄阁书章程,并议定经费禀》,丁丙时期月经费不足四十两白银。

1.3.3 读者身份的确认策略

现代读者可使用身份证等文件与图书馆建立信任。但对两百多年前的南三阁管理者来说,核实读者身份以保护书籍安全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的开放时间略晚于南三阁,其针对读者身份的认证实施了一套严谨的程序。具体而言,“欲入观书者,先将其来意住址写明,交总管阅看”,“未入先二日须有荐函致总管。如荐举人果系可靠,本人只写住址钤姓名即可入内”,“荐函如不可靠,总理即不许入,或与董事同议之”^[7]。

鉴于当前文献资料的稀缺性,关于南三阁在确认读者身份方面所采用的具体程序及制度设计,尚无法给出确切的结论。回溯乾隆颁布的第三道御旨,“……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2]。然而,清代学者王魏胜(字杏村,浙江仙居人)在《湖山集跋》中提及了早期借阅时的不愉快经历,“然有司过事谨藏,非官府通声气者,无由假抄”^[8]。可见,读者借阅需提供身份证明,如官府担保文书。这是当时图书馆的一贯操作。

1.3.4 编纂便于检索的书目

为了便于读者高效检索阁内藏书,南三阁设有两套书目,即详尽书目和简明目录。

据钱鲈香的笔记,“文澜阁在圣因寺右……阁中除简明目录外,另有目录册四本”^[5]。文澜阁的目录体系分为简明和详尽两种类型,并备有多份副本,以便多名读者同时检索与查阅,提高藏书的使用

便捷性及效率。

据清代完颜麟庆《文汇读书图》,“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爱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4]。该记载虽未详尽描述书目具体形态,但可据此确认文汇阁备有书目以供查检。

1.3.5 工作时间安排策略

文澜阁留存的详尽资料清晰地描绘了关于书阁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文澜阁志》记载:“每年以正月二十一日为展览之期,五月稍停止展览。停止后,将全书翻晒一月。七月初一日再行展览至十二月二十日停止。每日展览时刻,三月至八月上旬八时至下午五时止,九月至二月上旬九时至下午四时止,以星期日为假期,停止展览。”^[9]

文澜阁的工作时间安排与现代相似。每年六月和春节前后的1个月闭馆,六月用于图书维护,春节前后则让员工休假。文宗阁与文汇阁的安排可能类似,但具体细节未能考定。南三阁管理者遵循乾隆指示,确保读者借阅便利,致力于提升借阅效率。

2 南三阁公共开放的史实

判断南三阁藏书借阅政策是否公共开放,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公共开放原则,深入研究文献资料是了解其是否符合这一原则的主要方式。幸运的是,部分文人记录的借阅经历为我们呈现了当时借阅状况的真实画面,为客观评价提供了依据。

本文为研究南三阁读者身份对借阅行为的影响,将读者分为三类,即书阁管理者上级领导、其他官员或学者、学生群体,并分析他们在借阅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

2.1 书阁管理者上级领导的借阅史实

从学政到巡抚,阮元自1795年起于浙江任职。其任职时间长达十年,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政务繁忙之余,他充分利用文澜阁所藏的丰富图书资源,编纂与修订了多部重要著作。正如他在《重刻测圆海镜细草序》中所言:“测圆海镜,何为而作也……惜流传之本,不可多得。元视学浙江,从文澜阁《四库全书》中抄得一本。”^[10]

凌廷堪在《与阮伯元阁学论画舫录书》中也提到:“书在文澜阁,取之甚便。”^[11]

张鉴《包山葛氏澄波皓月楼藏书记》亦详细记载了阮元以文澜阁管理者上级领导的身份借书的事情,“既而在琅嬛仙馆校进四库未见之书,发西湖文澜阁所藏,胥吏持印帖往取,辄数十百匣,堆积满案,得书至一百六七十种”^[12]。由此可见,阮元的身份

为他借阅文澜阁藏书带来了巨大便利。当然,这样做的不仅仅是阮元一人。

清代学者刘凤诰在《五代史记注识语》中提到:“丁卯使浙江,暇取文澜阁书,一一校详,加以搜掇……”^[13]刘凤诰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八月被任命为浙江提督学政,其间与巡抚阮元交往甚密。由其自述可知,他也将文澜阁藏书“取出来”使用。

清代徐时栋所著《清征举孝廉方正郑君墓碣》记载:“君讳继高……而苏潭方召诸征士作史籍考,尽辇文澜阁书置藩署蓬峦轩……”^[14]苏潭,即谢启昆。谢启昆在任浙江按察使期间,为编纂《史籍考》,将文澜阁中的书籍用车运至官署,由此可见其借书规模之大,同时也足见其身份所带来的便利性。此外,谢启昆在写给孙渊如观察的信函《复孙渊如观察》里,亦提及其在编纂《史籍考》期间大量借用四库书。

清代丁晏《制科孝廉方正苏征君传》记载:“征君讳秉国,字均甫……时文端视学浙江,延君至试院,关借文澜阁易院,君得尽读秘书,所学益进。”^[15]文端即汪廷珍,官至礼部尚书,嘉庆十八年(1813年)任浙江学政。苏秉国,字均甫,号蒿坪,淮安清河人。汪廷珍以官方行文的方式将文澜阁的藏书借出,属员苏秉国借此便利,得以大量阅读四库秘书。

完颜麟庆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中,有一幅名为《文汇读书图》的作品,该作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他的文汇阁之行。文中述及:“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庚子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斋大使,同诣阁下……爱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得钞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嘱觅书手代钞。”^[4]道光十九年(1839年)至二十一年(1841年),完颜麟庆担任两江总督。在此期间,在两位两淮盐运使司官员的陪同下,他得以亲临文汇阁,一睹藏书风采,并受到了热情接待。

汪士铎于《南北史补志表后序》中记载:“往者道光戊申、己酉间,江夏童石塘(濂)太守权鹺政,延仪征刘孟瞻(文淇)年丈……余以家累,不克作远游,乃分任补两《史》志表,而属草于里门。家鲜藏书,不能如诸君借阅文汇阁也。”^[16]汪士铎深刻表达了家中藏书的匮乏,以此反衬文汇阁藏书的丰富以及借阅的便利。童濂曾任淮北盐场海州分司运判,后迁护理运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童濂邀请多位学者为《南史》《北史》作注,颇为借重文汇阁藏书。

上述材料所呈现的受众群体,均为南三阁管理者的上级领导,他们在书阁中获得的服务品质无疑达到了较高的标准。能将大量藏书借出使用,这充分体现了乾隆对于图书借阅全面开放的宏伟愿景。

2.2 其他官员或学者的借阅史实

其他官员或学者的文献记录了多次进入南三阁抄录藏书的经历,包括单独前往和结伴同行两种情形。此外,还有文献记载了他人抄录以及委托他人抄借的事迹。

有人记录了多次入南三阁借阅的过往:

李富孙,字既沔,籍贯浙江嘉兴,肄业诂经精舍,嘉庆六年(1801年)拔贡生。其所著《校经叟自订年谱》记录了他多次前往文澜阁借阅书籍的事迹,“庚寅六十七岁……七月,又赴文澜阁,阅四库书,仍寓诂经精舍,复访采阁书之外,纂辑闽事”^[17]。李富孙阅读四库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关于福建的资料。

邓显鹤,字子立,嘉庆九年(1804年)举人。在其所著《沅湘耆旧集前编》中有一条按语,“邓转运深……有《绅伯集》二卷,见《四库全书总目》。外间无传本。余往客扬州,屡从文宗阁藏书中求之”^[18]。这明确表示他在客居扬州期间,多次赴文宗阁借阅藏书,抄录《绅伯集》。

耿文光,山西灵石县人,同治元年(1862年)举人,其在文章中忆述了多次光顾文汇阁抄写并校书的经历,“兹在维扬,复就文汇阁钞写,前获者亦悉就校无讹”^[19]。这表明四库书完全能够满足他抄写与校勘工作的需求。

上述三位人士前往南三阁,意在利用其资源,通过抄写、校对或编辑等方式取得学术成就。然而,学者王福基三次访问文澜阁寻找资料,却均未成功。

王福基,江苏如皋人,秀才,其曾记述:“基在浙,曾三诣文澜阁,周览藏书之目录,亦未获只字……王福基谨序。”^[20]

有人记录了单独前往的经历:

祖之望,福建浦城人,官至刑部尚书,曾记录其经历,“吾邑真山民……比岁家居,属梁芷邻仪部、祝东岩太守校刊邑中遗书,乃移书杭州,就文澜阁借抄付梓,而识其梗概如左。”^[21]为了开展《真山民集》的校对工作,祖之望特意前往杭州,从文澜阁借阅并抄录了所需书籍。

曾任浙江台州知府的徐士銮,于《医方丛话》中记载了其入阁借阅并抄录大部头书籍的事情,“钱塘魏玉璜之琇《续名医类案》六十卷,世无刊本。余从文澜阁借四库本录一部,凡六十六万八千余

言……”^[22]

缪荃孙在《丹阳集跋》中详细记载了借助文澜阁的藏书资源,抄录并刊行巨著《丹阳集》的过程,“《丹阳集》二十四卷,宋葛胜仲撰……今从文澜阁录副,取以刊行”^[23]。缪荃孙,字炎之,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随即被授予翰林院编修。

以上3个案例展示了从文澜阁抄录并校对四库本的过程,特别是文澜阁对大部头书籍的收录,对这一工作有显著的帮助。本文仅依据文献信息判断他们为单独行动,而实际情形可能更复杂。

有人回忆了多人结伴入阁借书的美事:

张文虎留下的文本中有多次在钱熙祚带领下多人同赴文澜阁借阅藏书的记录,“乙未冬,雪枝辑《守山阁丛书》时,苦无善本,约同人侨寓湖上之杨柳湾。其地去孤山二里许,面湖环山。上有楼,楼下集群胥。间日棹扁舟,诣阁领书。钞毕,则易之”^[24]。由此可见,张文虎不仅多次造访文澜阁,而且是与多人一同前往的。此外,这条记载还揭示了一个独特之处:他们能够借出文澜阁的藏书。这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除了文澜阁管理者上级领导的唯一一次例外情况。在张文虎的另外两篇文章《乾坤体义跋》《十三间楼校书记》以及钱应溥与诸可宝的文字中,均可见到相关记载。

有人将他人入阁借阅藏书的事迹视为佳话记录于文献:

清代叶廷琯《吹网录》记载一事,“仁和胡君心耘,前年从文澜阁钞得《燕语》一编,以考异所订尚未尽”^[25]。胡埏抄得《燕语》一编,与手中版本相互考订,可惜的是未能完成所有工作。

清代重新修订的《青浦县志》记录了一件往事,“方祖范,字养余,贡生,为人有操守,精研经史,尝至西湖假阅文澜阁四库书,于四书类尤笃嗜,晚年成《四书解琐言》若干卷”^[26]。方祖范在文澜阁精研四书类书籍,晚年著成《四书解琐言》。

梁同书的《华氏春草轩诗册跋》一文回溯了一件事情,“秋槎之令嗣校书文澜阁,见卞永誉《书画汇考》,内详载春草轩始末,复得五七言十首,皆此册所无,因录出”^[27]。秋槎,即清代著名学者严廷中,其子在文澜阁见到了《书画汇考》一书,该书可补其手中版本未载的内容。

还有学者回忆了委托他人代为借抄的往事:

李兆洛,字申耆,嘉庆十年(1805年)中进士,担任江阴书院主讲二十余年。李兆洛在其文章中提及

自己曾多次入阁借阅并抄录藏书。不仅如此,他还曾委托友人至杭州文澜阁代为抄录书籍。《墙东类稿序》记载,“《墙东类稿》则散佚已久……既语清臣,即属友人于浙之文澜阁录取原本以还”^[28]。

清代钱泰吉曾记录:“余读荀悦《汉纪》,苦其太简,欲求王氏益之《西汉年纪》,不可得。丁酉夏日,屠筱园为传钞于文澜阁。”^[29]钱泰吉,字辅宜,号警石,浙江嘉兴人。屠湘之,字筱园,浙江会稽人,道光戊戌进士,曾任杭州教授,代钱泰吉至文澜阁抄书。

清代萧穆在《〈光绪续修句容县志〉序(代)》中记载了辗转委托他人至文澜阁抄书的曲折经历,“近有邑人杨芷香学博,闻杭州文澜阁有旧刊本,乃倩其所亲江宁傅若生明经,交钱塘丁修甫孝廉展转假钞”^[30]。

《昌国州图志》中按语记载,“余又贻书朱司马述之先生,属往文澜阁补抄二牒。司马复书言阁本亦无此二篇”^[31]。这表明该书编者曾委托好友朱述之至文澜阁寻找两篇佚文,然而四库本也未录入。

关于文澜阁的开放借阅,清代潘衍桐曾赋诗表达一番感慨,“西冷才隽甲东南,盛举真能助美谭。悦许借书来阁外,丰湖有约不能贪”。诗旁附有按语:“阁上书不能借,恐致失落。吾友梁节庵主讲丰湖书院时,建有书藏,定借书约,详明可行。”^[32]¹¹⁰从诗与按语可知,当时文澜阁藏书可供借阅的做法使很多人受益,但借阅仅限于阁内,不得将书籍带离,潘氏因此颇觉遗憾。

潘衍桐的言论可能暗示其他官员或学者与书阁管理者上级领导在借阅服务上存在差异,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这些读者群体大体符合乾隆的设想,他们能够进入书阁阅读和抄录书籍,表明南三阁的公共开放政策具有显著的社会价值。

2.3 学生群体的借阅史实

就南三阁读者中的学生群体而言,当前资料仅显示诂经精舍学生与文澜阁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尚未发现其他学生进入文澜阁借阅书籍的明确记录。这一现象或可推断,若无官方提供的有效凭证,学生群体在取得借阅资格方面确实面临较大障碍。

清代钱仪吉《周官新义识后》一文提及阮元在任职浙江巡抚期间,许可诂经精舍学生借文澜阁藏书进行抄录一事,“往仪征相国抚浙时,许诸生就杭州文澜阁写书,余录得经说十数种,此其一也。是为永乐大典本”^[33]。

胡琮《近闻中丞许诂经精舍士子恭诣文澜阁读秘书》云:“山围杰阁峙千寻,近许翻书惠士林。万

柳阴中消夏课,松风凉石镇池心。”^[32]⁷⁴此诗充满欣喜之情。

有文献记载了清人的实际经历,这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书籍开放借阅的管理工作状况。王魏胜《湖山集跋》曾叙述相关遭遇,“《湖山集》……藏西湖文澜阁,例许士人抄读,然有司过事谨藏,非官府通声气者,无由假钞。胜伏处茅庐,屡欲一读其集,尝三至文澜阁,而管钥谨严,徒倚门外而已”,“癸卯之春,学使罗萝村先生遴十一郡经术词章之士,檄赴肄业诂经精舍,胜猥备斯选……”^[8]王魏胜所述的未得入阁阅览之事,发生于其进入诂经精舍研习之前。王魏胜的控诉言辞极具感染力,生动形象地描绘出远道而来的年轻学子的悲怆与无奈,令人十分同情。不过,这也直接揭示了在日常管理中,书阁管理者要求读者出示由官府提供的相关文书作为身份之凭证,以获取信任,方能借阅这一事实。阮元特许诂经精舍学子入阁研习,实为“通声气”的具体体现。此外,王魏胜所说的“例许士人抄读”,以及他不辞辛劳赶赴西湖的举动,恰恰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南三阁向全国读书人开放之规已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上述三组案例表明,多数读者具有官方背景,这显示出读者身份与书阁借阅服务相关。官僚及其关联人员因接近官僚体系,更易验证身份,而与官僚关系疏远者,身份验证的机会成本高,借阅机会少。这或许就是文献中官僚及其亲友、学生占据大量篇幅的原因所在。

3 南三阁公共开放的影响

3.1 图书机构类型比较意识的生发

乾隆开放南三阁的决策,在当时及后续时期都广受文人学子的高度赞誉。这一举措的社会反响在鸦片战争后尤为显著,当国人开始接触并认识西方近代图书馆时,南三阁促使他们对不同性质的图书机构进行比较性认知。这无疑是乾隆开放南三阁决策的深远影响的最佳体现。

清代薛福成考察西方后,对中西方图书机构作了一段比较性评价:“其藏书之富:法国有书楼五百所,藏书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英国书楼二百所,藏书二百八十七万两千册;俄国书楼一百四十五所,藏书九十五万三千册……中国《四库全书》,缥緗之富,超轶前代。他如扬州之文汇阁、杭州西湖之文澜阁、镇江金山之文宗阁,皆得四库副本,亦藏书之公所也。”^[34]

薛福成以“亦藏书之公所也”的判断,精确地揭示了南三阁与欧洲各国公共开放图书机构在功能属

性上的高度一致性,即都承载着公共图书馆的职能。此举将南三阁置于与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同等的维度,明确判定两者在性质上的一致性,具有开创性。鉴于薛福成的身份、阅历与深厚的学识,他对南三阁的认知应是真实且深刻的。同时,作为当时国内对欧洲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的先驱,他对中外图书机构的异同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薛福成在论述时并未将北四阁、中央主要藏书机构、地方学府及各地书院等藏书之所纳入比较范畴,这显然是基于他对这些机构与南三阁之间本质差异的深刻理解。具体而言,南三阁之所以独树一帜,关键在于面向公众开放的借阅制度与实践。这一显著特征不仅为薛福成所洞悉,亦广泛获得当时士人阶层的认同。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他们方能将南三阁与近代欧洲各国公共图书机构进行类比,并深切认识到两者在公共开放上的共通之处。

3.2 引领后期图书馆建设

晚清国人在探讨公共开放图书机构建设的议题时,南三阁常被作为典范提及。确切地说,南三阁在晚清作为公共开放图书机构建设的标志性典范,为后续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与精神滋养。

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疏》中论述推广学校建设时提到,图书馆是必备教辅机构:“一曰设藏书楼也……高宗纯皇帝知其然也,特于江南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籍,恣人借观……泰西诸国,颇得此道,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于此。今请依乾隆故事……”^[35]在提议构建藏书楼之际,李端棻援引了乾隆设立南三阁的先例,并明确指出乾隆深知开放借阅的道理。而“泰西诸国,颇得此道”,意在阐述南三阁与西方各国所推行的公共图书馆理念不谋而合,均强调了对公众开放的原则。后来,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也继承了李端棻的言论^{[36]106}。

针对地方建设图书馆的意义,张亨嘉在《浙江藏书楼碑记》中提到:“天以教育宏我圣清。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缮写颁发,而浙之文澜阁遂与文宗、文汇鼎峙东南……稍阐文澜阁藏书之精意,非仅规抚西法已也。”^[37]可见,浙江藏书楼的开放建设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既蕴含了文澜阁的开放精神,又借鉴了西方的经验。

徐树兰在《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中阐述将自家藏书楼向公众开放的缘由时,特地点出乾隆修建南三阁的影响,“伏念高宗纯皇

帝特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籍,津逮后学”^{[38]141}。由此可见,常被赞誉为私家藏书开放先驱的古越藏书楼,也深刻秉持南三阁的书籍开放借阅精神,以广泛泽被学子。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在阐述建设国家图书馆的重大意义时,详细提及了乾隆的行为,“高宗纯皇帝开四库之馆,荟萃载籍,建阁储藏,著录之数,综十六万八千册。又于热河及镇江、扬州、杭州等处,并建藏书之阁,颁给《四库全书》各一份,士子就阁读书,得以传写,所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者,至周至渥”^{[38]155}。南三阁的公共开放政策不仅惠及了当时的学者,也对后世产生了正面影响,即便到晚清,国家图书馆的建设亦可追溯至南三阁所倡导的开放精神。

《山西巡抚宝棻奏山西省建设图书馆折》^{[36]144}与《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广西建设图书馆折》^{[36]165}两文表明,山西省巡抚宝棻与广西省巡抚张鸣岐一致认为,南三阁的开放实践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堪与欧美早期图书馆建设媲美。

因此,即便不谈世界图书馆历史,仅将南三阁视为中国图书馆公共开放事业的滥觞,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南三阁在建筑设计布局、制度框架构建、书目编制规划、管理人员配置以及经费筹措等方面,均紧密围绕公共开放这一核心目标。其对后续清代图书馆公共开放建设的深远影响与启迪作用,是实际存在且为其他因素难以企及的。乾隆初衷或为何,不得而知。不过,乾隆的举措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图书馆公共开放模式的萌芽,并对晚清乃至民国初年中国图书馆公共开放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的确是事实。

参 考 文 献

- [1] 顾志兴. 文澜阁四库全书史[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18.
-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御笔诏令说清史:影响清朝历史进程的重要档案文献[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119.
- [3] 王国平. 杭州文献集成:第13册[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
- [4] 郭向东,易雪梅,岳欣. 文溯四库[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195.
- [5] 张崑. 西湖文澜阁规制征故[J].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4(2):27-34.
- [6] 王晓霞. 网维国本:晚清官书局研究[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46-47.
- [7] 郑观应. 郑观应集:上册[M]. 夏东元,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08.
- [8] 程章灿. 古典文献研究:第20辑下[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17.

- [9] 童正伦. 文澜阁与藏书[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06(2): 74-76.
- [10] 孔国平.《测圆海镜》导读[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49-50.
- [11] 凌廷堪. 凌廷堪全集: 第3册[M]. 纪健生, 校点.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199.
- [12] 任访秋.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散文集 1[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1: 39.
- [13] 刘凤诰. 五代史记注识语[M]//刘凤诰. 存悔斋集: 第12卷.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830(清道光十年): 9.
- [14] 宁波市江北区史志办公室. 江北历代名门望族资料选编[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8: 461-462.
- [15] 丁晏. 制科孝廉方正苏征君传[M]//雪堂丛刻. 上虞罗氏, 校刊.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时间不详]: 19.
- [16] 杨翼骧, 孙香兰. 清代史部序跋选[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97.
- [17] 李富孙. 校经叟自订年谱[M]. 刻本.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844(清道光二十四年): [页码不详].
- [18] 邓显鹤. 沅湘耆旧集: 第1册[M]. 欧阳楠, 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2007: 346.
- [19] 谷际岐. 历代大儒诗钞六十卷[M]//耿文光. 万卷精华楼藏书记: 第138卷. 太原: 山西省文献委员会, 1934: 8.
- [20] 刘煥, 陆振声, 刘式譔, 等. 如皋县志[M].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时间不详]: 卷首 1.
- [21] 王岚. 望江集: 宋集宋诗宋人研究[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206.
- [22] 陆以湜. 冷庐医话[M]. 李明, 沈成, 点评.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21: 179.
- [23] 缪荃孙. 艺风堂文集: 下册[M].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7: 553-555.
- [24] 徐珂. 清稗类钞选[M]. 无谷, 刘卓英, 点校.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180.
- [25]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汉语大词典: 第11卷上[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 282.
- [26] 汪祖绶. 中国地方志集成: 光绪青浦县志 民国青浦县续志[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1: 310.
- [27] 梁同书. 频罗庵遗集: 第11卷[M]. 刻本.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817(清嘉庆二十二年): 15-16.
- [28] 李兆洛. 养一斋文集: 第2卷[M].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时间不详]: 3.
- [29] 杨丽莹. 扫叶山房史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92.
- [30] 谭其骧. 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 第2册[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288.
- [31]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 第10册[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9: 4729.
- [32] 王国平. 西湖文献集成: 第20册[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4.
- [33] 王安石. 周礼新义[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778.
- [34] 薛福成. 薛福成日记: 下[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711.
- [35] 张周全. 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21: 18.
- [36] 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7] 顾志兴. 浙江藏书史[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8: 422-423.
- [38] 吴晞.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The Practice and Impact of Public Access in the Southern Three Pavilions of the *Si Ku Quan Shu*

Zhang Yinlong¹ Shi Weiwei¹ Chi Yu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2.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During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ern Three Pavilions of the *Si Ku Quan Shu*, Emperor Qianlong explicitly designated them as national-level libraries open to the public. He issued three successive imperial edicts to elaborate on their significance. From the day of their completion, all aspects of their operation—including personnel management, financial planning, spatial layout, catalog compilation, and scheduling of opening hours—were closely centered around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access. Furthermore, an examination of borrowing records from senior officials, local administrators, scholars, and students reveals that the firsthand borrowing experiences of these literati serve as compelling 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 Southern Three Pavilions'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access policies. Historically, the commitment to public access upheld by the Southern Three Pavilions, along with it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not only marked a new stage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but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models of public access in librarie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ccess in librarie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ctively incorporated Western public library concepts, yet its roots and inspiration can still be traced back to the pioneering practices of the Southern Three Pavilions of the *Si Ku Quan Shu*.

Keywords Southern Three Pavilions; Library; Public access